

文心探访

老莫是高人！

从《一号文件》到《王院纪事》

文 / 朴 实

老莫，即莫伸。因为混熟了，我们都习惯这样叫他。

那天，室外下着小雪，寒气逼人，餐厅里却洋溢着暖烘烘的热气。一伙对脾气的文友在一起聚餐，那位被大家称作“老莫”的人，就坐在我邻座。开席前，他忽然伸出筷子，在桌子上点了点，声音洪亮地转向满桌的人：“瞧咱老蒲，退休了，反倒精力更旺，四部长篇，一年半一部，不得了啊！”我慌忙摆手，自觉脸烧得厉害，嘴里反复念着“不行不行”。这时，著名文化学者商子雍慢悠悠地开了口：“老蒲是不简单。可你们看看这位——”他的目光温润地落在莫伸身上，“小说、剧本，那是屋子里熬得出的功夫；他那一部又一部的报告文学，可不是‘坐’出来的。那得一脚泥、一身土，从人堆里、从地头里，硬生生‘刨’出来的。”话音一落，满桌便荡起一片会心的赞叹：“老莫是高人！”

这话，是实实在在的。

我总以为，写小说的，是造梦的匠人，守着心炉，将过往的烟雨与遐思，反复熔炼，便能铸出一方独立的世界。笔锋所至，便是山河。可报告文学的笔，却是一把尺，一杆秤，容不得半分虚浮的想象。它的墨，须得混着田野的风沙，蘸着当事人的血汗，才能落在纸上，有着千钧的分量。莫伸便是后者。他编导的电视剧《郭秀明》，让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魂，透过荧屏，叩响了无数人的心扉；那部60万字的《一号文件》，更是将黄土高天的沟壑梁峁，化作了连天的青苗与炊烟，在千家万户的屏幕上活泛起来。

高人之所以为高人，大抵在于他总做着些常人看来“多余”的事。

那回，我偶然与他提起铜川市印台区早已退休的区委书记冀军，说他是上世纪80年代初，顶着漫天争议，冒着极大风险，最早将土地和耕牛“分”到农户手中的人。我本只是闲谈，莫伸的眼却倏地亮了，像暗夜里擦燃的火柴。没几日，他竟真的风尘仆仆地来到铜川。在新区一间不大的屋子里，两位志同道合的人，一壶酽茶，便消磨了整个下午。阳光从西窗慢慢地爬进来，又悄悄地褪出去。我只看见莫伸微微前倾着身子，手里那个泛黄的笔记本，一页一页翻过去，写满了密密的字。那些字，吃墨很深，力透纸背。

我终是忍不住心底的疑惑，送他出门时，轻声

问：“你那《一号文件》早已成书，还这般下功夫搜集材料，做什么用呢？”

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越过塔吊挥臂的工地，投向远处，笑了笑说：“有些材料，是写进书里的；有些材料，是写进心里的。”

这话，我当时并未全懂，只觉得像一句玄妙的箴语，便让它随风散了。直到许多年以后，他新出的《王院纪事》摆在了我的案头。

翻开它，扑面而来的，仍是那片深沉的土地，却已换了人间气象。书里仍有如《一号文件》里那股滚烫的、带着体温的故事。他描写了旬阳县棕溪镇王院村的“领头雁”们，如何带领乡亲，在新时代的隘口，近乎执拗地闯出一条条生路。那些细节，带着泥土的腥气与汗水的咸味，鲜活地跳动着。然而，不止于此。我清晰地看见，笔锋在叙事中常常沉稳地一顿，荡开一层理性的波纹。那是对于“三农”肌理沉静的剖析，是对于土地与人心、传统与现代、生存与远方的深邃凝视。更有一些段落，分明闪烁着别处山水的光影，是他的足迹与思考曾丈量过的，更为广阔的田野经验的汇流。

《王院纪事》，如同穿越一场跨越十八年的精神苦旅。莫伸用十八年的断断续续，构建了一种与他的写作对象相称的节奏——不是一蹴而就的宏大叙事，而是如农人耕作般缓慢而坚实的记录。这种时间跨度赋予作品一种独特的质感：当大多数作家急于捕捉当下，莫伸却选择与时间同行，让故事在时光的河流中自然沉淀。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是对快节奏时代的一次静默反抗。当三十多万字沉淀在纸上，当一百多个人物在文字间复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王院村的地理变迁，更是一个时代如何在普通人身上刻下印记，而普通人又如何以血肉之躯回应时代的叩问。

我被书中的人和事感动着，两天时间里，时而泪目品读，时而掩卷沉思，时而拍案叫绝！

支部书记陈分新和妻子刘忠群的故事之所以令人动容，恰恰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身残志坚”或“无私奉献”的俗套框架。当有人劝说陈分新用亲生女儿换取医药费为妻子治疗骨癌时；当苦苦等来的假肢却做反了令妻子绝望地放声痛哭时；当陈分新在个人家庭与公共责任间痛苦挣扎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被神化的英雄，而是被命运反复捶打却依然选择站立的人。莫伸没有回避生活的

残酷质地——那做反了的假肢，既是一个黑色幽默，也是对中国底层农民的贫穷、无奈与人性冷漠的双重隐喻。

书中那个令人心酸的顺口溜：“人走山路猪坐轿，人在流汗猪在笑，不是猪儿爱坐轿，只怪山上没有道。”以民间智慧的形式道出了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道路不通的核心困境。陈分新们所做的，正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荒谬——修路、拉电、引水、改顺、发展产业，每一步都是将人从自然与历史的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努力。莫伸没有将这一过程浪漫化，他忠实记录了其中的争吵、谩骂、怀疑、失败与妥协，让变革的复杂性得以完整呈现。

作为报告文学，《王院纪事》的最大价值或许在于它的“纪事”本身。莫伸将自己置于观察者而非评判者的位置，让事件和人物自己说话。当陈分新从复员军人到村主任、村支书，再到省劳模、党的十六大、十九大代表，这一轨迹没有被简化为直线式的上升叙事，而是充满了偶然与必然的碰撞，坚持与放弃的交织。书中的一百多个人物，包括众多的乡镇领导郭正明、赵颜龙、杨锋、刘启刚、陶俊勇、赵德义、李向阳、屈轩、吴申意等，村支书陈分新，村长李光明，副支书柯常林，村里的老干部李春辉、王隆生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见解与命运，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立体图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莫伸没有停留在对成就的歌颂上。他敏锐地捕捉到发展背后的代价——传统的流失、人际关系的重构、种粮食不赚钱，依靠土地无法支撑和满足新的生活需求。当王院村的村民终于“口袋鼓起来”，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青壮劳力纷纷外出打工，土地没有人耕种怎么办？想规模养殖却碰触了不能占用基本农田的红线怎么办？实行移民搬迁和集中安置，原址上的土地撂荒了怎么办？野猪大面积毁坏庄稼，但它属于保护动物，用棍棒撵不走怎么办？又比如说，规模种植能提高效益，这在理论上完全成立，但真正面对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莫伸对这些从不人云亦云地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深入调查，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他发现，村里诸多的烤烟种植户中，以承包二十亩到三十亩的效益最好，如果承包六十亩或者更多，效益反而会上滑。原来承包的面积越多，用工费用就越大，而大面积的烟田使得管理难以精细，使粗放型的雇工不期

然而地形成了新的“大锅饭”，于是单位种植面积的效率效益下滑就成为必然。

调查到此，情况已经了然，但莫伸没有浅尝辄止，而是继续深入——农民不笨，农村干部不笨，既然承包大户不赚钱，为什么村里还鼓励承包大户呢？结论最终还是在调查中显现——承包大户的出现，既解决了贫困户就地就业的问题，又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柯常林承包的200亩烤烟，每年除给国家提供至少10万元的财政收入，还能够带动村里20户以上的贫困户脱贫，它同时解决了土地撂荒问题。从很大意义上讲，“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就在这样一些司空见惯的经济活动中呈现。

从《一号文件》到《王院纪事》，莫伸完成了他对中国农村变革的双重书写：前者是宏大叙事，记录了制度变革如何解决生存的问题；后者是解剖麻雀，揭示了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持续发展的曲折和艰难。当电影《支书和他的媳妇》搬上银幕时，我们不应忘记，银幕之外有更丰富的纹理、更复杂的矛盾、更真实的生活。在《王院纪事》里，它们不再是零散的见闻，而是化作了血脉，化作了骨骼，支撑起一部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创业史”与“沉思录”。这种全景式的呈现，使《王院纪事》超越了单纯的成功学叙事，成为一部再现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复杂性的珍贵文献。在这个意义上，《王院纪事》不仅是一部书，更是一座桥梁——连接城市与乡村，连接政策与民生，连接政府与百姓，连接历史与现实。它提醒我们，在中国急速的城市化浪潮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依然有故事值得被倾听，有坚韧与挣扎值得被铭记。莫伸用十八年时间完成的这部作品，最终成为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变迁，更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集体奋斗史。那一本本写满的笔记，那些“多余”的探访，那些“无用”的聆听，原来从未被他搁置。这般写作，这股为人，这股勤奋，是需要些“笨功夫”、得有些“痴气”的。而这“笨”与“痴”的尽头，站着的，便是一个能写出时代心魂的作家。

当我合上书本，王院村的炊烟似乎还在眼前袅袅升浮，而那些普通人的坚韧与挣扎，已悄然成为我们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此刻，我从心底由衷地赞叹：老莫是高人！

除雪保畅速写

文 / 张守明

昨夜寒潮袭陕南，雪拥国道车不前。
妇孺幼啼连声起，寒风如刀呵气暖。
路如冰场脚难住，车心滚珠原地转。
忽有橘红如天降，铲冰保畅送温暖。
灾情似令全局动，挥汗如雨保平安，
旅客难中得救助，热泪喜涕湿衣衫。
护路铁军名不虚，党旗高擎心如磐。

（作者供职于汉中市公路局）

诗意人生

木兰花·衡阳怀古

北来湘水雁峰斜，东洲年年落平沙。
可怜岳阳楼上客，只忧庙堂不问家。
云中帝子虚白发，斑竹点点计芳华。
但向虞皇求一醉，胜与贾生论桑麻。

（作者供职于华阴管理段）

行香子·访书院

渭城朝雨，衡阳雁去。
念苍梧、关山何恨。
潇湘人远，云梦仙殊。
且忆屈子，谒吕黎，拜溪溪。

遗经在抱，教化勤传。
此间是、圣学渊源。
金声玉振，学达性天。
可习岳麓，听石鼓，问船山。

2012冬，自秦中下潇湘，过湖望岳，怀古思人，访船山、石鼓、岳麓三书院，并作词一阙。

下潇湘

文／周峰



三秦交通

文／图 李艳

龙兴渡口：渭河上的最后守望

在咸阳兴平市汤坊镇龙兴村渭河北岸，静静卧着一处承载着千年故事的渡口——龙兴渡口。它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身姿虽已不再挺拔，却依旧坚定地守望望着渭河。如今，这里已成为渭河咸阳段最后一个仍在使用的传统渡口，宛如一颗遗落人间的明珠，延续着汉唐以来的摆渡记忆。

千年历史：从帝王传说到百姓生计

站在渡口边，极目远眺，对岸便是西安周至县。渭河如一条宽阔而灵动的丝带，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将两地轻轻相连，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情谊。这渡口的历史源远流长，能一直追溯到汉代。传说东汉光武帝刘秀落难至此，前有大河阻拦，波涛汹涌似张牙舞爪的猛兽；后有追兵紧逼，马蹄声声如催命的战鼓。危急时刻，河面上突然出现一艘小船，宛如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助他渡河脱险。刘秀登基后，这渡口便得名“龙兴渡口”，从此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记，仿佛被帝王之气所笼罩，带着一种神秘而庄严的色彩。

唐代，龙兴渡口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那时，渭河两岸百姓往来频繁，贸易活动如火如荼。商人们赶着马车，带着琳琅满目的货物，在渡口间来回穿梭。渡口边人声鼎沸，叫卖声、马蹄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交响乐。船夫们在波涛中熟练地穿梭，响亮的号子在河面上回荡，构成一幅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画面。

20世纪50年代，龙兴渡口进入了鼎盛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两岸的交流更加密切。渡口不仅有大型渡船，船身庞大而坚固，能承载众多乘客和货物；还有专门人员管理调度，他们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渡船的往来，确保渡口的安全与有序。渡船不知疲倦地往返，像一位忠诚的使者，在两岸之间传递着希望与梦想。

最后坚守：一条钢索、一艘木船、一个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交通方式发生了巨变。一座座大桥如巨龙般横跨渭河，公路、

铁路四通八达，像一张巨大的交通网络，将各地紧密相连。许多渡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遗忘在岁月的角落里。但龙兴渡口像一个倔强的守望者，依然坚守在渭河北岸。

坚守源于一个简单的现实：对两岸村民而言，绕行最近的大桥需多走40多公里，对于务农、上班的村民来说，渡口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成为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今，龙兴渡口保持着最原始的过河方式：一条钢索、一艘木船、一位守了40年的老船工。当你来到渡口，依然能看到那艘斑驳的木船静静地停靠岸边，船身的油漆已经剥落，露出粗糙的木板，露着岁月的沧桑，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光辉岁月。船夫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在这里摆渡已经几十年了，对这片水域，这艘船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熟练地解开缆绳，双手紧紧握住钢索，靠着这条钢索，这艘人力渡船缓缓驶向对岸。老人一边操控船只，一边和乘客聊天。他讲着渡口故事，从刘秀渡河的传奇到唐代的繁荣景象，从20世纪50年代的鼎盛时期到如今的坚守，仿佛这些故事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对渡口深深的眷恋和热爱，让乘客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年代。

坐在渡船上，感受微风拂面，看着波光粼粼的河面，心中涌起莫名的感动。这渡口不仅仅是一个过河的地方，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历史的延续。当我踏上渡船时，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那个纯真无邪的年代，那种熟悉的感觉、亲切的氛围，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心。每到节假日，渡口会迎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倾听渡口故事，拍照留念，记录下美好的瞬间。

龙兴渡口深深地烙印在渭河的记忆中，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设施，更是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种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

（作者供职于咸阳收费站）

絮语轻谈

看山时，花落无人拾

文／罗凤英

桂花开了又谢，酒坛满了又空。趁秋夜的凉露漫过窗棂，我念的，究竟是那年浸着桂香的酒，还是那个敢将山河一饮而尽的我？

秋分时，晚风携来一缕桂香，这香气清冽如旧，倒像是被风揉碎的旧时光从记忆里漫了出来，裹着泥土气、竹篮的草腥气，还有少年时指尖被花枝扎出的血珠的微甜，像极了后来我偷尝的第一口桂花酒。

“快看，下桂花雨啦！下桂花雨啦！”邻家阿姐总爱拉着我拾那些掉落的花瓣，奶奶把桂花和着新米蒸成桂花糕，甜香裹着热气儿漫了满院。我趁她不注意，偷捏了一块烫嘴的桂花糕塞进嘴里，米香混着花香在舌尖化开，烫得我直跺脚也舍不得吐。阿姐问：“桂花糕会一直这么甜吗？”我说：“当然啦！你看这树，明年还会长更高，花还会开更密，我们能摘好多好多桂花，蒸好多好多米糕！”

那时总以为，桂花树会永远站在院子中央，枝丫永远够得着天空，竹篮永远装不满金粟。以为时光就像鬓边的桂香，会一直萦绕不散，可我们哪里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多“后来”。

高二那年的秋天，桂香依旧漫进窗棂，混着粉笔灰的涩、试卷油墨的淡，还有晚自习后夜风里的凉。我回了趟老家，还没进院门，就先看见那株桂花树。我站在树下，指尖几乎要触到当年那簇最密的花。不是树矮了，是我长高了。可肩膀上的书包沉得厉害，压得我连抬手摘朵花的力气都没有。

金粟飘在水泥地上，沾了灰，再没有以前“桂花雨”的鲜亮。我蹲下身，拾起一瓣沾着泥的花，花瓣蜷着，仿佛在做：“秋走了，我留不住。”孩童时以为，举着花就能留住秋，就像以为未来的路会铺着桂花糖，连风里都该永远飘着“甜味”。

可花从来只是花，只是我把不肯长大的念想、不敢选择的怯懦，都寄托在了那簇金黄里。它会谢，就像时光会走，就像曾经以为清晰的方向，其实只是少年人眼里永不凋零的错觉。当年追着花瓣跑、举着花问秋归处的孩子，早该明白，没有哪朵花能永远悬在枝头，就像没有哪个秋天会为谁停驻归程。

办公楼下也栽了两株桂树，细瘦的枝干还需竹竿支撑。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时，偶尔夹杂飘进一缕淡得几乎抓不住的桂香。那股香裹着咖啡的焦糖玛奇朵味，混着穿西装的人衣襟上的香水气，倒比故乡后山的桂香多了几分“人间烟火”，只是这烟火太轻，飘在五层楼的窗户里，明明散着香，却抓不住半分实在的甜。

我总能想起故乡山里的桂树，彼时秋深，整座山都浸在金桂的香里，花瓣厚得能铺满青石板路，踩上去“沙沙”响，像踩着一床晒干阳光被。如今隔着办公楼的玻璃回望，当年的青石板路或许已被新的落叶覆盖，而楼下这两株桂树，还在努力把细瘦的枝丫往天光里伸。它们开的花极小，风一吹就簌簌落，落在停车场的沥青地上，碎成星子般的泥。保洁阿姨扫落叶时会一并扫走，竹簸箕里“哗啦”一响，倒像是把我对整个秋天的怀念都倒进了垃圾桶里。

此刻再看那两株桂树，竹枝撑着的枝干虽细，根却早已悄悄地往水泥缝里钻。这本就是它们的宿命，当年在山间开得

